

欢迎按以下格式引用:刘玉成,冯亚. 劳动力返乡创业、产业转型升级与农民增收——来自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J]. 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6, 49(1): 49-58.

# 劳动力返乡创业、产业转型升级与农民增收

## ——来自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

刘玉成<sup>1,2</sup> 冯亚<sup>1</sup>

(1. 长江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2. 长江大学 长江经济带发展研究院, 湖北 荆州 434023)

**摘要:**劳动力返乡创业是带动农户增收、全面振兴乡村的重要举措。论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2022年四期连续追访的平衡面板数据,利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增收的影响。研究发现:(1)劳动力返乡创业显著带动农户增收;(2)产业转型升级是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路径;(3)异质性分析发现:相较于上游地区,劳动力返乡创业对中、下游地区农户收入的促进作用更强;相较于低收入农户,劳动力返乡创业对高收入农户的增收效应更强。基于此,地方政府应持续加大对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支持力度,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特色产业集群培育,实施创新引领与包容发展双轨推进。

**关键词:**劳动力返乡创业;产业转型升级;农民增收;长江经济带

**分类号:**F062.9;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395(2026)01-0049-10

###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战略定位。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农民增收与生活富裕已取得显著成效: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经从2014年的10489元增长至2024年的23119元,实现了翻番式增长。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同期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呈现明显放缓态势,年增长率由11.2%下跌至6.6%,收入增速放缓反映出农民增收面临内生动力不足的结构性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构建可持续的农民收入增长长效机制成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亟

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近年来,随着“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持续推进以及城乡推拉博弈的动态发展,我国劳动力流动模式正经历深刻变革。传统单一劳务输出的“打工经济”正逐步向多元化发展的“创业经济”转型,返乡创业呈现井喷式增长态势。根据农业农村部调查显示,截至2024年底,我国返乡创业人员规模累计近1300万人。其中,返乡创业农民工作为返乡创业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凭借其外出务工积累的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返回户籍所在地开展创业活动,不仅带动农村产业创新发展,还通过就业岗位创造,加速农民向非农行业转移,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生力军<sup>[1]</sup>。长江经济带作为横跨东、中、西三大区域的国家战略区域,覆盖全国五分之二以上的

收稿日期:2025-08-16

基金项目:湖北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项目“长江经济带劳动力返乡创业促进产业富民的效应及路径研究”(24Y044);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双重社会网络嵌入视域下经济精英返乡创业的富民效应与路径研究”(25BGL196)

第一作者简介:刘玉成(1970-),男,湖北荆门人,教授,博士,主要从事劳动经济与产业经济研究。

通信作者:冯亚(1999-),男,湖北恩施人,主要从事产业经济研究,E-mail:827880153@qq.com。

人口和经济总量。研究选取长江经济带作为样本区域,既能反映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典型特征,又能凸显流域经济梯度发展的特殊情境。基于此,本文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研究长江经济带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及其作用机制。具体而言,本文提出如下研究问题:劳动力返乡创业能否带动农民增收?产业转型升级对劳动力返乡创业促进农民增收是否具有中介效应?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是否存在异质性?厘清上述问题不仅可为构建国家返乡创业政策体系提供实证依据,同时对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和共同富裕目标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目前,学术界关于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1)部分学者认为劳动力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民增收。魏滨辉等(2024)的研究表明,返乡创业者创办的企业相比农村本地企业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这种效率优势显著带动了农村家庭经营性收入、工资性收入及财产性收入的同步提升<sup>[2]</sup>。邓金钱等(2024)认为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带动农民收入增长<sup>[3]</sup>。曹宗平(2019)、汤龙等(2023)指出劳动力返乡创业能够激发产业间的联动效应,推动乡村产业结构升级,由此提高农村居民收入<sup>[4,5]</sup>。王轶等(2022)基于2019年返乡创业企业调查数据证实,农民工返乡创业通过企业家精神、政府扶持政策、银行正规信贷支持以及数字技术运用的中介效应来促进农民增收<sup>[6]</sup>; (2)也有部分学者指出劳动力返乡创业普遍具有投资规模有限、行业门槛较低及核心竞争力欠缺等特征,使其在同质化市场竞争中面临较高风险,即使采用具有成本优势的自雇模式,其收益也往往不及外出务工收入<sup>[7,8]</sup>。杨丹等(2021)的实证结果表明,农民非农创业仅对中高收入农户具有增收效应,同时会扩大收入差距<sup>[9]</sup>。此外,罗竖元(2020)发现,地方政府制定返乡创业政策时存在对农民工弱势创业者的歧视性待遇,“关系户”特权引发的挤出效应会进一步恶化创业环境,成为阻碍农民创业增收的阻力<sup>[10]</sup>。李周(2019)则强调劳动力返乡创业带来的实质改变更多体现在职业身份转换和家庭福祉改善,而非直接收入增长<sup>[11]</sup>。

上述文献对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农民收入进行了多方面的探讨,为进一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但尚有两点不足:(1)其研究方法多依赖横截面数

据,虽能有效捕捉特定时点的静态特征,却难以充分探究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长期动态变化的持续性影响;(2)现有文献较少基于微观视角,对返乡创业活动的增收效应及其作用机制进行实证分析,尤其缺乏对由此驱动的产业转型升级如何切实促进农民增收这一关键路径的系统探究,这为后续研究提供了拓展空间。因此,本研究着眼于促进农民增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2022年面板数据,将研究区域聚焦于长江经济带所涵盖的11个省(市),并以农村家庭作为研究对象,实证检验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异质性检验。相较于已有研究,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1)基于微观追踪数据实证检验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增收效应,克服了宏观研究在因果关系识别上的不足,为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农民增收提供了直接支持;(2)本文尝试将劳动力返乡创业、产业转型升级与农民收入纳入统一的分析框架进行综合考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相关研究;(3)从地理位置和收入水平等视角深入探索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农民收入过程中可能存在的异质性特征,以期为后续针对性地激发返乡创业活动的促农增收效应提供决策参考。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 (一)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在乡村振兴战略全面实施的背景下,劳动力返乡创业热潮方兴未艾,正日益成为带动农民增收致富的重要驱动力<sup>[8]</sup>。劳动力返乡创业主要从以下四个方面促进农民增收:第一,劳动力返乡创业有效引导城市经济要素向乡村流动,催生大量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如民营小微企业、专业合作社),扩大农户就业空间。这些主体凭借信息与资源优势,打破乡村传统封闭格局、提高各种资源整合的效率,提升农户生产经营水平,并推动小农户与大市场的有效衔接,为农户收入稳定增长奠定基础<sup>[12,13]</sup>;第二,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社会关系网络发挥强大的示范效应,激发农民创业动力。其企业家精神的扩散推动农民从要素供给者向价值创造者的角色转变,这一转变促进了创业集群的形成。借助集聚所产生的规模经济效应既直接提高了农民的经营性收入,又依托创业实体为缺乏创业基础的农村留守妇女和高龄老人等弱势群体提供就近就业、兼业机会,减少外出务工流动成本,间接提高了农民的工资性收入<sup>[14,15]</sup>;第三,返乡劳动力以人力资本的跨区域流动实现技术

扩散。在创业过程中,通过“干中学”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使其逐步积累专业的生产管理知识和适应市场需求的技能,从而促进乡村人力资本的整体提升。这将激活农村要素活力,打破农村地区发展的资源约束瓶颈,激励其不断创新,由此为农民增收注入内生动力<sup>[5]</sup>;第四,返乡创业劳动力兼具乡土内生性与外来资本的嵌入性。在应对资本下乡嵌入式问题中,返乡创业劳动力精英基于“血缘”和“地缘”,会更加注重维护乡村利益,成为连接资本与乡村的重要纽带,其构建的制度化合作框架,既解决了外来资本排斥问题,又消除了部分机会主义行为<sup>[16]</sup>。这种组织联结机制不仅促进了乡村与下乡资本的良性互动,也助力返乡创业者实现自身创业规模的扩大化,进而增强其雇用本地劳动力、盘活闲置宅基地与耕地资源的意愿与能力,最终有效提升农村居民的工资性收入与财产性收入。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劳动力返乡创业能够促进农民增收。

(二)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作用机制

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赋能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发展的方式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具体体现在:第一,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外出务工经历使返乡创业人员具有较高非农生产效率优势<sup>[17]</sup>,因此具备更高非农就业能力。这种能力优势促使返乡创业劳动力表现出更高的土地流转意愿,加速了农村土地要素市场化进程,并释放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而带动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此外,劳动力返乡创业形成的产业集群通过促进资金、技术、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空间集聚和协同联动,实现农村产业间要素集约配置的“帕累托改进”,还基于技术溢出效应实现产业链纵向延伸,进一步提升产业竞争力,构建起涵盖生产、销售、服务的全产业链体系<sup>[18]</sup>。由此可知,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优化和产业集群效应,实现生产要素的帕累托改进与全产业链整合,从而推动产业结构向合理化发展;第二,驱动产业结构高级化。返乡创业劳动力借助“互联网+农业”和“互联网+工业”等现代经营模式,将城市消费需求精准传导至生产端,引导生产端基于市场信号优化产品设计与服务供给。这种以品质化、个性化需求为导向的发展模式,通过整合区域资源和特色优势形成地方品牌,突破了产品同质化、低端化的发展桎梏,促进了绿色有机农业、农产品精深加工业、特色旅游等高附加值产业的兴起,推动劳动密集型产业向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转型<sup>[19]</sup>,

从而实现了产业结构高级化演进。因此,促进劳动力返乡创业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手段。

产业转型升级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产业结构不断趋于合理化能够弱化产业内和产业之间资源配置的时间、空间局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细分产业的成本收益结构,促进各部门间生产协调和劳动报酬均衡,从而提升农村居民收入水平<sup>[20]</sup>。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一方面,可以促进优势产业中先进技术交流与融合,从而加速技术创新进程,这些创新成果通过技术溢出效应向农业部门扩散,最终实现农业劳动生产率提升和农民增收;另一方面,有助于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向生产效率更高的二三产业,这一过程为转让土地给企业的农民创造了非农就业机会以提高工资性收入,又通过土地流转增加了家庭财产性收入<sup>[21,22]</sup>。此外,农业人口的相对减少使得农业劳动力人均资源占有量提高,有助于留守农户实现规模化经营,进而提高农业经营收益。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农民增收。

(三)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异质性影响

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受到当地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市场环境等因素制约,导致其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不同地区存在差异。与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相比,中下游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成熟的产业链以及更良好的营商环境,使得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增收具有更强的辐射带动效应。随着交通、电力、通讯等硬件设施的不断完善,返乡创业劳动力的物流运输效率得以提升,信息获取渠道更加通畅,生产要素调整越容易,这些优势为农民工返乡创业带动农民增收提供支持条件。成熟的产业链可以为劳动力返乡创业活动提供更高效的上下游配套服务,通过降低原材料采购、产品销售等环节的交易成本,提高农产品附加值,从而强化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户增收的促进作用。营商环境优化可以改善农民创业和就业的外部环境<sup>[23]</sup>,一方面,这将更好地激发返乡劳动力创业活力,从而带动周边更多农户参与配套生产和服务,实现农民收入增长;另一方面,也使得返乡企业和村户在返乡创业收益的具体分配上有了更多的选择<sup>[24]</sup>。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3: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区域异质性。

创新精神是企业家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sup>[25]</sup>。低收入返乡创业劳动力限于创新能力,容易陷于同质化竞争陷阱,导致其创业边际收益递减。相比之下,具备较高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积累的高收入返乡劳动力创业的意愿可能更强烈,也更容易适应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从而获得更优的创业绩效,进而吸纳更多劳动力就业,最终实现富民增收的发展目标。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4: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增收的影响存在收入异质性。

### 三、研究设计

####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的研究数据为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6~2022年四期调查数据及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宏观数据,CFPS定期收集覆盖全国25省(市)的家庭数据,调查内容涵盖个人基本信息、人口迁移、家庭经济活动等维度,为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农民收入的关系探讨提供了重要的数据支撑;宏观数据则来源于各年度《中国统计年鉴》及各省份的统计年鉴。在样本处理方面,研究限定为年龄在16~65岁的农村样本,剔除关键变量缺失样本后,最终获得2088个农户家庭的四期平衡面板数据。

####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 1.被解释变量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收入(*Inc*),以家庭总收入(万元)取自然对数进行度量。

##### 2.解释变量

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劳动力返乡创业(*Entrepre*)。首先借鉴刘新民等(2022)<sup>[26]</sup>的做法,将家庭关系问卷中离开家庭所在地打工的家庭成员、出现在外出打工家庭名单上且工作地点与家庭所在地不在同一区县的家庭成员以及个人问卷中个人不在家庭所在地的家庭成员界定为流动人口。之后,匹配后一期数据,找到回到家庭所在地居住的样本界定为返乡劳动力。最后,将家庭经济问卷中出现在从事个体私营名单或个人问卷中回答工作类型为“私营企业、个体工商户以及其他自雇”的返乡劳动力定义为返乡创业劳动力样本,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此外,采用家庭返乡创业人数(*Entrepre1*)作为稳健性检验的解释变量,家庭返乡创业人数选取家庭所有参与返乡创业活动的成员人数进行度量。

##### 3.控制变量

本文参考孙继国等(2023)<sup>[27]</sup>、徐辉等(2022)<sup>[28]</sup>

的研究,将可能影响农民增收的控制变量 *X* 分为三类。其中个人层面选取户主个人特征,包括年龄(岁)、性别(男性=1,女性=0)、婚姻(已婚=1,反之=0)、工作状况(在业=1,失业或退出劳动力市场=0)以及教育年限(未上学=0;小学=6;初中=9;高中、中专、职高技校=12;大学专科=15;大学本科=16),这些变量可以反映户主的生产能力和人力资本水平;家庭层面包括自有住宅(有=1,没有=0)、社会资本(家庭人情支出礼取对数)以及征地(有=1,没有=0),这些变量可以反映农户家庭的物质资本和社会网络资源。此外,本文还控制了所在地区可能影响农民收入的宏观因素:经济发展水平(当地省份人均GDP 并对其取对数处理)、金融发展水平(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占名义GDP 比重)。这些变量可以体现农户所在地区的总体经济发展水平和外部环境。

#### 4.中介变量

本文借鉴袁航等(2018)的研究<sup>[29]</sup>,从产业高级化和产业合理化两个维度构建产业转型升级指标评价体系,并利用熵值法进行测度。

产业结构合理化能反映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间的合理配置,本文借鉴干春晖等(2011)的研究<sup>[30]</sup>,采用改进的泰尔指数进行度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Tl_{i,t} = \sum_{m=1}^3 y_{i,m,t} \ln(y_{i,m,t} | l_{i,m,t}), m = 1, 2, 3 \quad (1)$$

式(1)中, $y_{i,m,t}$ 代表*i*地区第*m*产业在*t*时期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l_{i,m,t}$ 代表*i*地区第*m*产业在*t*时期从业人员占总就业人员的比重。为了研究的便利,本文采用泰尔指数的倒数并除以100衡量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

产业结构高级化主要表现在产业间比例关系的优化调整,其核心特征是指低水平产业向高水平产业转移,本文采用产业结构层次系数来进行度量,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Ais_{i,t} = \sum_{m=1}^3 y_{i,m,t} \times m, m = 1, 2, 3 \quad (2)$$

式(2)中, $y_{i,m,t}$ 代表*i*地区第*m*产业在*t*时期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各变量的基本描述性统计如表1所示。

#### (三)模型设定

为探讨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本文构建如下形式基准回归模型:

$$Inc_{it} = \alpha_0 + \alpha_1 Entrepreneur_{it} + \alpha_2 X_{it} + \theta_i + \sigma_t + \epsilon_{it} \quad (3)$$

其中,  $i$  表示农户,  $t$  表示年份,  $Inc$  代表家庭总收入的对数,  $Entrepre$  代表劳动力返乡创业,  $X$  是

包含个体、家庭、地区三个层面控制变量的集合;  $\theta_i$  和  $\sigma_t$  分别为个体、年份固定效应;  $\epsilon$  为随机扰动项。

表 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类型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观测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民收入	$Inc$	2088	2.110	0.758	0.000	6.404
核心解释变量	返乡创业	$Entrepre$	2088	0.075	0.263	0.000	1.000
	返乡创业人数	$Entrepre1$	2088	0.085	0.316	0.000	3.000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合理化	$Tl$	2088	0.155	0.225	0.029	1.226
	产业结构高级化	$Ais$	2088	2.429	0.092	2.305	2.741
	产业转型升级	$Stru$	2088	0.144	0.178	0.009	0.893
个人控制变量	年龄	$Age$	2088	45.482	10.324	17.000	65.000
	性别	$Gender$	2088	0.559	0.497	0.000	1.000
	婚姻状况	$Marriage$	2088	0.896	0.305	0.000	1.000
	教育年限	$educ$	2088	7.669	4.240	0.000	16.000
	工作	$Work$	2088	0.892	0.310	0.000	1.000
家庭控制变量	自有住宅	$Housing$	2088	0.901	0.298	0.000	1.000
	社会资本	$Soc$	2088	7.645	2.418	0.000	11.695
	征地	$Land$	2088	0.085	0.279	0.000	1.000
地区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	$Lngdp$	2088	11.035	0.403	10.361	12.104
	金融发展水平	$Fin$	2088	1.512	0.320	0.892	2.432

为检验劳动力返乡创业是否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进而促进农民增收,本文参考江艇(2022)的研究方法<sup>[31]</sup>,进一步构建产业转型升级( $Stru_{it}$ )中介效应模型,模型如下所示:

$$Inc_{it} = \alpha_0 + \alpha_1 Entrepreneur_{it} + \alpha_2 X_{it} + \theta_i + \sigma_t + \epsilon_{it} \quad (4)$$

$$Stru_{it} = \beta_0 + \beta_1 Entrepreneur_{it} + \beta_2 X_{it} + \theta_i + \sigma_t + \epsilon_{it} \quad (5)$$

其中,  $Stru$  为中介变量,代表产业转型升级,其余变量与式(3)相同。

#### 四、实证结果及分析

##### (一)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

为判断变量之间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在回归前使用方差膨胀因子  $VIF$  检验,结果显示各变量的  $VIF$  值最高为 1.68,变量的  $VIF$  值小于 10,说明本文选取变量较为科学合理,可以推断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根据  $Hausman$  检验和冗余固定效应检验发现,  $Hausman$  检验统计量为 82.96,其伴随概率  $p=0.000$ ,  $F$  值为 3.86,其伴随概率  $p=0.000$ ,所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来研究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在同时控制时间和个体固定效应后,基准回归模型的拟合优度提高,说明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更为合理。为了减少异方差问题并提升结论

稳健性,本文使用聚类标准误进行修正。表 2 报告了逐步回归结果。

表 2 是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影响的回归估计结果。其中,列(1)为加入核心解释变量和个体、时间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列(2)~列(4)是在列(1)基础上逐步加入个人层面、家庭层面及地区层面控制变量并同时固定个体和时间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四种回归结果均显示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效应为正,且在 1% 水平下显著,模型(4)的结果显示,劳动力返乡创业会使农户收入提高 21.4% ( $e^{0.194} - 1$ ),由此验证假设  $H1$ ,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引入资金、先进技术和营销管理经验,有效激活农村经济,拓展增收渠道,促进农户收入增长。

在控制变量方面,从户主个体特征上看,户主年龄与农民收入具有负相关性,可能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导致劳动效率逐渐降低;性别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男性户主收入更高,可能源于资源获取优势或劳动力市场歧视。另外,从本文的估计结果来看,农户的婚姻、工作状况和教育水平对农民收入的影响并不显著。从农户家庭特征上看,自有住宅、社会资本和征地均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具体而言,拥有房产的农户更容易获得银行抵押贷款,进而扩大生产投资规模并提升经营性收入;社会资本较高的农户能够通过获取有效就业信息、技能培训

机会及物质资源支持等途径提高个人收入<sup>[32]</sup>;土地征收一方面推动农户转向非农工作以提高工资性收入,另一方面通过土地征用补偿款直接提升其财产性收入。从地区特征上看,人均GDP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高经济发展水平的地区一般都有良好的创业就业环境,为农民增收提供了

系统性支撑;金融发展水平系数显著为负,可能的原因是,一方面,农村部门正规信贷配给制度不完善,金融制度环境有待改善,导致金融资本在农村地区的配置效率低下<sup>[33]</sup>;另一方面,农村地区缺乏有效的投资项目,难以实现农村金融资源的高效利用。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i>Inc</i>	(2) <i>Inc</i>	(3) <i>Inc</i>	(4) <i>Inc</i>
<i>Entrepre</i>	0.221***(0.073)	0.202***(0.072)	0.189***(0.069)	0.194***(0.069)
<i>Age</i>	—	-0.007***(0.002)	-0.006***(0.002)	-0.006***(0.002)
<i>Gender</i>	—	0.070**(0.035)	0.066*(0.035)	0.063*(0.035)
<i>Marriage</i>	—	0.141**(0.069)	0.095(0.066)	0.105(0.066)
<i>educ</i>	—	0.006(0.007)	0.007(0.006)	0.007(0.006)
<i>Work</i>	—	0.088*(0.052)	0.080(0.052)	0.079(0.051)
<i>Housing</i>	—	—	0.119**(0.050)	0.129**(0.051)
<i>Soc</i>	—	—	0.029***(0.006)	0.029***(0.006)
<i>Scale</i>	—	—	0.249***(0.051)	0.248***(0.051)
<i>Lngdp</i>	—	—	—	0.385**(0.180)
<i>Fin</i>	—	—	—	-0.238**(0.117)
常数项	2.094***(0.012)	2.105***(0.152)	1.768***(0.159)	-2.150(1.956)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2088	2088	2088	2088
调整的R <sup>2</sup>	0.582	0.588	0.604	0.605

注:括号内为聚类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下显著。下同。

(二)稳健性检验

本文采用替换核心解释变量、剔除直辖市数据及剔除异常值等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核心变量度量方式

为确保实证结果的可靠性,将核心解释变量的度量方式替换为家庭返乡创业人数(*Entrepre1*),回归结果见表3的(1)列。劳动力返乡创业的估计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证明其对农民增收效应是稳健的。

2. 剔除直辖市数据

直辖市会获得更多政策优惠和资源配置,可能作为异常值影响稳健性,为强化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和普适性,剔除上海、重庆两个直辖市数据后重新估计模型,回归结果见表3的(2)列,劳动力返乡创业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说明该结果具有稳健性。

3. 降低极端值干扰

为防止极端值对基准回归结果准确性的干扰,

本文对农民收入以及控制变量进行上下1%缩尾处理,重新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见表3的(3)列。劳动力返乡创业的估计系数在1%水平上显著,表明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解释变量 (1) <i>Inc</i>	剔除直辖市 (2) <i>Inc</i>	剔除异常值 (3) <i>Inc</i>
<i>Entrepre1</i>	0.144** (0.062)	—	—
<i>Entrepre</i>	—	0.194*** (0.069)	0.174*** (0.064)
常数项	-2.249 (1.999)	-2.150 (1.956)	-2.185 (1.914)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2088	1879	2088
调整的R <sup>2</sup>	0.604	0.605	0.610

### (三)内生性检验

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农民收入之间可能存在内生性问题。一方面,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农民收入的同时,收入较高的农户也表现出更强的创业活动参与倾向,从而产生反向因果关系;另一方面,某些随时间变化的不可观测因素(如企业家精神、地区公共服务水平等)不仅对劳动力返乡创业规模和决策产生影响也会影响农民收入水平,造成遗漏变量问题。为缓解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如下方法进行相关估计。

#### 1. 考虑延续性

参考罗明忠等(2023)的研究<sup>[20]</sup>,在基准回归模型中引入被解释变量农民收入的一阶滞后,以缓解不可观测的时变因素导致的估计偏误,回归结果如表 4 列(1)所示,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回归系数依然显

著为正,再次证实劳动力返乡创业能够带动农民收入增长,本文的基准回归结果稳健。

#### 2. 工具变量法

为排除双向因果而出现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进行参数估计,以滞后一期的劳动力返乡创业水平作为工具变量。滞后一期的劳动力返乡创业水平与当期劳动力返乡创业水平高度相关并与其他变量和扰动项无关。回归结果如表 4 列(2)、列(3)所示,*Kleibergen-Paap rk Wald LM* 统计量的 *P* 值显著,拒绝了工具变量不可识别的假设,弱工具变量检验中 *Cragg-Donald Wald F* > 16.38,说明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上述检验结果表明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农民收入增长的结论仍然存在。

表 4 内生性检验结果

变量	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	工具变量法	
	(1) <i>Inc</i>	(2) <i>Entrepre</i>	(3) <i>Inc</i>
<i>L. Entrepre</i>	—	0.153**(0.069)	—
<i>Entrepre</i>	0.224**(0.095)	—	0.197**(0.096)
<i>L. Inc</i>	0.281*** (0.091)	—	—
常数项	13.035*** (0.091)	2.674* (1.442)	—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1566	1566	1566
调整的 $R^2$	0.621	0.430	0.419
<i>Kleibergen-Paap rk LM</i>	—	31.509 ( $P=0.001$ )	
<i>Cragg-Donald Wald F</i>	—	88.531 ( $F(10\%)=16.38$ )	

### (四)机制检验

本文选择产业转型升级作为中介变量,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列(1)为基准回归结果,列(2)显示劳动力返乡创业对产业转型升级具有正向影响且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水平检验。这说明产业转型升级在劳动力返乡创业促进农民收入增长过程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假设 H2 得到验证。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空间集聚形成规模效应,并依托技术创新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在农村和城镇催生新产业与新业态,填补了县域经济产业链空白。这一过程促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从农业转移到非农产业并提高了农业劳动生产率,进而带动农户收入增长。

## 五、进一步研究:异质性分析

本文从区域、收入水平两个视角分析长江经济

带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增收作用的异质性。

表 5 中介效应机制分析结果

变量	(1) <i>Inc</i>	(2) <i>Stru</i>
<i>Entrepre</i>	0.194*** (0.069)	0.011** (0.006)
常数项	-2.150 (1.956)	-1.547*** (0.492)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个体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N	2088	2088
调整的 $R^2$	0.605	0.914

#### (一)地理位置视角

为识别劳动力返乡创业影响农村居民收入在不同地区的差异,将长江经济带划分为上游地区(包含

云南省、四川省、贵州省和重庆市)、中游地区(包含湖北省、湖南省、江西省)、下游地区(包含安徽省、江苏省、浙江省和上海市)三个区域分别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见表6。可以看出,在上游地区,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但结果并不显著,可能的原因在于,相比中下游地区,上游地区受限于地理位置和经济发展水平等原因,其物流效率已到“瓶颈”期<sup>[34]</sup>,导致劳动力返乡创业的运营成本攀升,叠加人口外流引发的本地消费需求萎缩,

表6 区域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上游地区	中游地区	下游地区
	(1) <i>Inc</i>	(2) <i>Inc</i>	(3) <i>Inc</i>
<i>Entrepre</i>	0.037 (0.093)	0.413*** (0.153)	0.298** (0.129)
常数项	-13.786 (9.048)	24.298* (12.400)	-1.625 (3.479)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观测数	1073	401	605
调整的 R <sup>2</sup>	0.507	0.557	0.563

使得劳动力返乡创业的促农增收效应难以充分发挥;在中游、下游地区,劳动力返乡创业均显著提升了农民收入,并且中游地区劳动力返乡创业的估计系数明显大于下游地区,可能的原因是:首先,中游区域作为传统劳务输出地,具有潜在的劳动力回流优势;其次,该区域土地要素价格相对较低,降低了创业初期的投资门槛;最后,中游地区以农产品深加工、生态旅游为代表的乡村产业快速发展,与返乡劳动力的务农经验、城市技能积累更加契合,使其成为带动农民增收的核心驱动力。假设 H3 得证。

(二)收入水平视角

为探讨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影响趋势的变化过程,本文进一步使用分位数回归。如表7所示,列(1)到列(5)分别是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在10分位点、25分位点、50分位点、75分位点和90分位点的回归结果。结果显示,在各个收入水平下,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均具有显著正向作用,随着分位数的增加,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不断增强,这说明高收入农户具有更丰富的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和物质资本,能够更高效整合资源,扩大经营规模,产生收入乘数效应,假设 H4 得证。

表7 分位数回归结果

变量	10%分位点	25%分位点	50%分位点	75%分位点	90%分位点
	(1) <i>Inc</i>	(2) <i>Inc</i>	(3) <i>Inc</i>	(4) <i>Inc</i>	(5) <i>Inc</i>
<i>Entrepre</i>	0.307***(0.079)	0.323***(0.078)	0.279***(0.066)	0.416***(0.089)	0.675***(0.153)
常数项	-7.947***(0.774)	-8.292***(0.641)	-6.750***(0.543)	-6.205***(0.599)	-5.891***(0.893)
控制变量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已控制
N	2088	2088	2088	2088	2088
<i>Pseudo R</i> <sup>2</sup>	0.216	0.190	0.179	0.173	0.169

六、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CFPS四期数据,选择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88个微观样本数据及对应省(市)的宏观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模型对劳动力返乡创业、产业转型与农民收入的内在联系展开实证分析。研究发现:第一,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该结论在经过内生性处理和稳健性估计后依旧成立;第二,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推动产业转型升级,进而实现农民收入

水平的提升;第三,劳动力返乡创业在中、下游地区对农民收入能产生正向推动作用,且中游地区劳动力返乡创业的增收效应更明显;第四,劳动力返乡创业对农民收入的促进作用随着收入的提高而增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地方政府应继续加大对劳动力返乡创业的扶持力度,充分发挥劳动力返乡创业对促农增收的作用,真正做到“带着老乡干,帮助老乡赚”。首先,完善乡村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人才、资金、技术下沉,从而进一步优化返乡创业投资环境,并对在劳动

力返乡创业活动过程中积极带动失地农民、失业人员等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的行为给予税收优惠和贷款贴息等方面的支持。其次,成立返乡创业交流与服务平台,为返乡创业劳动力和农户的利益保驾护航。依据创业者个人能力与本地资源禀赋,围绕当地龙头产业选择真正适合且相对熟悉的创业领域并为其提供相应技能培训,从而减少创业过程中的非理性决策。

第二,抓住劳动力返乡创业契机培育农村产业新业态。首先,定期开展返乡劳动力创业经验分享,对于特色创业方案重点宣传,加快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培育。其次,依托农村合作社、龙头企业等新型经营主体加快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再次,同步开发农村、城镇消费市场,助推休闲旅游、健康养老、农村电商等新兴产业建设,形成乡村产业链延伸和产品服务升级提质的良好局面。

第三,依托分区域精细化的劳动力返乡创业生态体系,形成“创新引领”与“包容发展”双轨推进机制,助力农民增收与农村共富。上游地区应依据自身民族文化、地域特色打造具有辨识度的乡村特色产业集群,通过制度性激励与政策精准供给吸引外部资本注入,强化返乡创业者与本地农户之间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提升“联农带农”的组织化与市场化效能;鼓励中游地区返乡劳动力逐步提高创业质量。以“数字下乡”为战略支点,打通城乡信息壁垒与要素流动障碍,发挥劳动力返乡创业在数字赋能方面的潜在能力,着力引导返乡劳动力创业向高质量、高层次发展,以进一步满足城镇消费者对乡村品质农产品的需求,进而促进农民增收。相比中上游地区,下游地区经济资源更丰富,对于劳动力返乡创业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应继续加大财政投入力度,创新金融产品和服务,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为支持返乡创业者开展科技创新研发业务提供有效支持,推动返乡创业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提高。最后,本文发现劳动力返乡创业对高收入农户增收的影响更明显,因此,应重点引导高收入农户开展创新创业,充分发挥其技术创新活力和就业带动潜力,并切实降低中低收入农户创业门槛和风险,推动返乡创业包容性发展,确保农村弱势群体能从返乡创业中获得更多福祉,最终实现农民收入可持续增长与农村共富的发展目标。

#### 参考文献:

[1]黄祖辉,宋文豪,叶春辉,等.政府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县域经

济增长效应——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J].中国农村经济,2022(1).

- [2]魏滨辉,罗明忠.返乡创业活动的收入效应研究[J].经济学家,2024(6).
- [3]邓金钱,蒋云亮.返乡创业试点政策对乡村振兴的影响研究——来自中国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J].中国人口科学,2024(1).
- [4]曹宗平.经济新常态下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多重动因与特殊作用[J].广东社会科学,2019(3).
- [5]汤龙,陈享光,赵妍妍.返乡创业能提高农村居民收入吗——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J].农业技术经济,2024(7).
- [6]王轶,刘蕾.农民工返乡创业何以促进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中国农村经济,2022(9).
- [7]贺雪峰.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逻辑与风险[J].求索,2020(2).
- [8]夏杰长,王鹏飞,贺俊.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内在积极性何以被激发:一个案例研究[J].东岳论丛,2024(1).
- [9]杨丹,曾巧.农户创业加剧了农户收入不平等吗——基于RIF回归分解的视角[J].农业技术经济,2021(5).
- [10]罗翌元.农民工返乡创业环境的结构优化[J].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5).
- [11]李周.农民流动:70年历史变迁与未来30年展望[J].中国农村观察,2019(5).
- [12]刘志阳,陆亮亮.新时代劳动力返乡创业何以破题——系统治理的框架建构与政策协同[J].探索与争鸣,2023(7).
- [13]王昆,崔菁菁.青年返乡电商创业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问题、典型案例和实践路径[J].经济纵横,2023(11).
- [14]张梁梁,李世强.外出务工经历、邻里关系与返乡农民工创业[J].人口与经济,2022(2).
- [15]江帆,宋洪远.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历史方位与实现路径[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3).
- [16]李群峰,侯宏伟.返乡创业精英如何引领乡村振兴:缘起、机理分析与隐忧[J].世界农业,2019(8).
- [17]贺小丹,董敏凯,周亚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工回流与农村资源配置——基于农民工返乡后行为的微观分析[J].财经研究,2021(2).
- [18]魏滨辉,罗明忠,曾春影.劳动力返乡创业与县域产业结构升级:理论线索与经验证据[J].中国农村经济,2023(10).
- [19]郭东,李琳,庞国光,等.农民工返乡创业何以缩小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基于返乡创业试点政策的考察[J].中国人口科学,2024(5).
- [20]罗明忠,魏滨辉.返乡创业、产业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J].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2023(1).
- [21]曹菲,聂颖.产业融合、农业产业结构升级与农民收入增长——基于海南省县域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21(8).
- [22]刘玉成,吴昊.数智化转型、产业结构调整与农民增收——基于长江经济带的实证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
- [23]王轶,刘蕾.返乡创业质量与农民共同富裕[J].统计研究,2024(5).
- [24]刘玉成,王贺元.收益分配视角下返乡创业主体的四方演化博弈:基于长江经济带的仿真研究[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5(4).

- [25]王轶,王香媚.农民工的社会网络能提升返乡创业企业经营绩效吗?——基于全国返乡创业企业的调查数据[J].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1).
- [26]刘新民,张衡,于文成.务工城市双创环境对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影响分析[J].农业技术经济,2022(11).
- [27]孙继国,赵文燕.数字金融素养何以推动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23(3).
- [28]徐辉,吴程琳.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基于CFPS2018数据[J].长江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
- [29]袁航,朱承亮.国家高新区推动了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吗[J].中国工业经济,2018(8).
- [30]干春晖,郑若谷,余典范.中国产业结构变迁对经济增长和波动的影响[J].经济研究,2011(5).
- [31]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中国工业经济,2022(5).
- [32]杨怡,王钊.社会资本、制度质量与农民收入——基于CHFS数据的微观计量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21(8).
- [33]张磊,王越,陈华帅,等.数字乡村建设、产业振兴与农户收入提升[J].财经研究,2025(5).
- [34]曹炳汝,邓莉娟.长江经济带物流业效率增长影响因素[J].经济地理,2019(7).

责任编辑 韩玺吾 E-mail:shekeban@163.com

## Labor Force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Farmers' Income Growth: Evidence from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Liu Yucheng<sup>1,2</sup> Feng Ya<sup>1</sup>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2.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Yangtze University,

Jingzhou Hubei 434023)

**Abstract:** Labor force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constitutes a vital initiative for augmenting farmer income and comprehensively revitalizing rural areas. This study utilizes balanced panel data from four consecutive waves (2016~2022) of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employing a two-way fixed effects model to examine the impact of returning-home entrepreneurship on farmer income with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Key findings indicate: (1) Labor force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exerts a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 on farmer income; (2)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serves as a critical transmission channel through which returning entrepreneurs elevate farmer income; (3) Heterogeneity analysis reveals the income-enhancing effect is more pronounced in the middle and lower reaches relative to the upper reaches, and stronger among high-income farmers compared to low-income farming households. Therefore, local governments should strengthen policy support for returning entrepreneurs, accelerate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specialized cluster development, and implement differentiated innovation-driven and inclusive growth strategies.

**Keywords:** labor force returning home for entrepreneurship;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farmers' income growth;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